

寻求繁荣与秩序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政治学观察

王丽萍 著

The Quest for Prosperity and Order
Contemporary World Economy and Poli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Science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求繁荣与秩序: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政治学观察/王丽萍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0

ISBN 7-301-11065-0

I. 寻… II. 王… III. ①经济-研究-世界 ②国际政治-研究
IV. ①F112 ②D5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09637号

书 名: 寻求繁荣与秩序——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政治学观察

著作责任者: 王丽萍 著

责任编辑: 刘金海

标准书号: ISBN 7-301-11065-0/D·1573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ss@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21

出版部 62754962

印刷 者: 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3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14.625印张 262千字

2006年10月第1版 2006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5.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目 录

导 论 认识当代世界:从重新界定世界开始	1
一、构成世界的不同类型国家	2
二、当代世界与中国	8
三、世界的发展趋势和国家的发展目标	13
四、世界体系冲突与合作中的国家学习	16
五、全球化的世界和高度分裂的世界	18
六、本书的内容和结构	20
第一章 世界经济体系:历史与反思	25
第一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世界经济	25
一、重商主义与比较优势理论	26
二、工业革命以来的贸易	28
三、货币与金融	30
第二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经济	31
一、战后重建与世界经济	32
二、世界经济制度与组织	34
三、1950 年以来的世界贸易与金融	36
第三节 当代世界经济的政治原因和结果	42
一、经济制度的政治意义	42
二、世界经济的政治性结果	44
第二章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原因、过程和结果	47
第一节 发展中国家的形成	47
一、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失落:资本主义的早期扩张	47
二、发展中国家:新的国家类型的出现	49
第二节 南北关系中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50
一、“南北关系”中的政治含义	50
二、南北关系的演变	53
三、南南合作与南北关系	56
第三节 世界贫富差距与南北关系	58

一、世界贫困问题	58
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贫富差距扩大的一般原因	62
三、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贫富差距扩大的国内根源	64
第四节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依附抑或相互依存?	70
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帝国主义与依附	70
二、依附与发展中国家的依附性发展	72
三、依附性发展的条件与前景	74
四、全球化与相互依存	76
第五节 小结	78
第三章 经济增长:战后国家政策的核心目标	80
第一节 经济增长的经济与社会基础	80
一、经济增长:理论与现实	80
二、增长的经济基础:传统变量的影响	84
三、增长的社会基础:制度、政治与文化	85
第二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经济增长	88
一、当代世界经济增长的总体状况	88
二、当代世界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	94
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	95
第三节 国际比较中的经济增长及其经济与政治意义	101
一、实际增长率和有价值增长率	102
二、经济增长差异的经济与政治结果	103
第四节 小结	105
第四章 经济调整与经济转型	107
第一节 经济体系的比较与学习	107
一、经济体系比较	107
二、经济体系的学习和特征转移	109
第二节 发达国家的经济改革	109
第三节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改革和转型	113
一、经济调整与“华盛顿共识”	113
二、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转型	118
三、中国的经济改革	125
第四节 经济改革与经济转型的政治分析	129
一、经济改革与国家的作用	129
二、经济改革与民主	132

三、社会结构与政治稳定	134
四、国家间关系	136
第五节 小结	137
第五章 治理与国家权威	139
第一节 治理危机:非洲的问题和世界的的问题	139
第二节 发达国家的治理与改革	142
第三节 “没有政府的治理”与国际关系	147
一、全球化和全球治理	148
二、全球治理中的制度设计	150
三、全球治理中的国家与主权	153
四、全球治理与国家(不)平等	158
第四节 小结	162
第六章 民主和民主化	164
第一节 争论与变动中的民主	164
一、民主与和平	164
二、多元化的世界与混乱的民主观念	166
第二节 战后早期的民主化	169
一、外国占领下的民主化	169
二、战后日本的民主化	170
第三节 “第三波”民主化	176
一、南欧的民主化	176
二、拉丁美洲的民主化	180
三、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民主化	185
四、亚洲的民主化	191
五、中东国家的民主化	199
六、非洲的民主化	202
第四节 小结	206
结 论 变动的世界与不确定的未来	209
参考文献	219

导 论

认识当代世界:从重新界定世界开始

从时间范畴来看,“当代”早已成为诸多学科进行相关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分期。在政治学研究领域,“当代”以来的世界变化不仅赋予这一学科更丰富、更有趣的研究素材,在充实政治学学科内涵的同时也使政治学的研究范畴得到了极大的扩展,更在政治学研究方法上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尤其是因行为主义等研究方法在这一学科的广泛使用而使政治学更像是一门“科学”,或更具有“科学性”。在研究方法与旨趣上,国际关系与政治学似乎已经渐行渐远了,但“当代”以来的世界变化,尤其是与之相伴生的新观念、新思想的大量涌现,以及人们思维方式的重要变化,使得政治学与国际关系之间又生长出了许多结合点,也使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研究中不能没有来自政治学的关注与思考。

“当代”一般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一段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在现实和理论上都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中之所以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作为重要的历史研究起点和开端,表面看来至少有这样几方面的原因。首先,世界上独立国家的数量大大增加;其次,原殖民地国家与原宗主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再次,一些国家发生的政权更迭(如中国)实际上已经超出了这些国家本身而获得了世界性的影响;第四,政府间国际和区域组织的出现。关贸总协定(GATT,1995年以后的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银行(World Bank)、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和战争结束后出现的世界范围的政府间组织,并对世界政治与经济秩序具有较为稳定的影响力。其后,各种类型的非政府组织在世界经济与政治舞台上的急剧增加及其影响力的增强,不仅使国家在世界经济与政治中的行动能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还使国际经济与政治仅仅成为世界经济与政治的一部分,而学者们在相关研究中也极力避免使用“国际”这一概念,以免使研究在概念的使用上不规范、不准确或使研究以偏概全。

事实上,学者们已经意识到“国际”与“世界”的这种差异,即使仍然习惯性地使用“国际”时也都会心照不宣地领会这个概念早已不是仅指“国家与国家”了。因此,在相关研究中有时会看到“世界”、“全球”和“国际”并用或混用的情形。二战结束后的这些重要变化导致世界权力分布和版图的变化,而人们对战争原因和结果的思考所引发的信仰的变化,尤其是决策者的信仰的变化,更使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地成为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的最重要的逻辑起点。

明确“国际”与“世界”的这种差异,既可以算做是对“世界”概念的基本界定和厘清,也彰显了世界构成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并对“世界是什么”作出了基本的回答,还提示我们考察和研究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时也应采取更多元的方法和崭新的思维。

对于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已有的研究主要是将世界作为一个体系进行研究的,重点集中于对主导体系的国家对世界的影响的研究。主导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国家似乎也主导着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和研究。这种研究的一个致命的缺憾,是忽略了对构成世界体系的不同类型国家的深入、专门的研究,如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研究。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不仅是对世界整体的认识,由于世界的多样性,对构成世界的各个部分的认识也是必要和关键的。事实上,对具体类型的国家,尤其是对对于世界的塑造似乎无关大局的欠发达国家的专门关注,才是对当代世界的更现实的关怀。

其实,将对不同类型国家的具体研究纳入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的范畴存在极大的风险,这样极易使人们把这种研究当作比较政治研究的翻版。虽然国家不过只是当代世界构成的一部分,但不同类型国家的国内经济与政治同世界体系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对于今天世界整体的塑造具有重要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并不总是表现为积极、主动的作用。因此,在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研究中,对不同类型国家的国内经济与政治及其互动关系的分析和探讨,是认识和解释作为整体的世界体系“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重要途径,甚至可能帮助人们作出世界“将来会怎样”或“向何处去”的预见。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将对不同类型国家的研究作为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同于比较政治的相关研究;也就是说,二者具体的研究内容可能相近甚至重叠,但其研究的着眼点却大为不同。

一、构成世界的不同类型国家

在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中,尽管国家的作用和地位受到了一些质疑,但民族国家仍然是当代世界最基本的政治单位和标准经济单位。今天的世界由近二百个国家组成,这些国家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都表现出了极大的

差异性。在分析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时,如果不对国家进行适当的类型划分而仅将世界体系中的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性的集合概念,或许是一个省事、偷懒同时也很有用的做法,但却无助于趋近对真实世界的了解。然而,如何划分不同的国家类型又使本来在每个人眼中就不同的世界更加复杂。

1. 三个世界——过时的国家类型划分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三个世界”是最熟悉、最方便和最有用的划分世界的方法。不仅中国人使用这一概念分析世界,这一概念还是政治学研究和世界政治研究中的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概念。但是,人们所使用的“三个世界”却有不同的涵义。

1952年,法国经济学家和人口统计学家阿尔弗雷德·索维(Alfred Sauvy)在《观察家》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第一次使用了“第三世界”(third world)。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人们广泛认识到需要一个术语来描述正在出现的在许多人看来与北美和欧洲旧国家有质的差异的国家。因此,这一概念也很快流行起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三个世界理论。其中,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是第一世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第二世界,而两大阵营之间是一大批刚获得独立的新国家。

中国人对“三个世界”概念的使用,源于毛泽东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面对甚嚣尘上的“美苏必战论”,毛泽东就提出了“中间地带论”;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爆发时,毛泽东又提出两类矛盾和三种力量的认识。其中两类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帝国主义的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三种力量,第一种力量是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国,第二种力量是二等帝国主义英法,第三种力量就是被压迫民族。这种按照世界基本矛盾的变化对世界不同类型国家的划分与其后来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是一脉相承的。197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具体地说,中国当时和现在所使用的“三个世界”的概念的内容是这样的:美国和苏联是第一世界,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属于第二世界,中国和广大的亚非拉国家构成了第三世界。毛泽东“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成为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理论依据和出发点,也成为中国人观察世界的重要坐标和参照系。应该说,毛泽东对“三个世界”的思考更多的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考虑,或者说是一种用以指导中国现实外交的、以实际上与中国关系的亲疏为基础的理论。

冷战结束前,西方政治学学者中比较流行的三个世界划分方法,则更多地体现了意识形态标准和经济发展水平在国家类型划分上的应用。按照其划分

方法,第一世界主要由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且拥有相似政治制度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构成,第二世界是指包括苏联和中国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世界则涵盖数量众多的经济发展水平低且政治、文化差异巨大的国家。

长期以来,第三世界作为一个国际政治的范畴,是指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之间的中间地区。随着冷战的缓和与结束,“第三世界”也逐渐失去其政治含义而主要体现为一种经济概念,以区别于发达的资本主义第一世界和开始转型的较为发达的前社会主义第二世界,从而使第三世界成为一个更广泛的范畴。在范围上,它包括拉丁美洲、除南非以外的非洲和除日本、以色列以外的整个亚洲;在国家数目上,世界上被纳入这一类型的国家超过120个,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生活的人口也占到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三。^①

从这几种不同的三个世界划分方法来看,它们对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的界定似乎存在太多的差异或者说根本就不同,但对第三世界的构成却有大体一致的看法。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第三世界国家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发展过程中的被动和孤立,也解释了第三世界国家能在冷战时期保持“积极中立”的可能性。

冷战结束后,苏联的解体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变化不仅使中国人眼中的第一世界坍塌了一半,也使西方人眼中的第二世界成为一个历史的国家类型。各个国家为自己定位的体系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作为与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相对应的第三世界似乎也成了—个孤独的—稳定类型。在这种意义上,三个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历史概念了,而只有“第三世界”还具有在一些学者看来是“可疑的”分析意义。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第三世界国家的国内经济与政治发展状况存在极大差异,“第三世界”似乎已经无法涵盖所有的情形,因此一些学者认为“第三世界的概念已经没有意义”^②,因而不—再使用这一术语。在纯粹的类型学意义上,“第三世界”本来就是个—个与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相对应的概念,或者说它的存在意义依赖于这两个概念,随着这两个概念失去其现实基础,“第三世界”似乎也不再具有存在的依据。但是,由于所有第三世界国家都面临构建民族国家和实现经济发展这两个问题或是其中的—个问题,它们在这方面的共性使其迥异于西方工业化国家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的东欧国家,因之也使这一

^① Jeff Haynes, *Third World Politics*,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6, p. 4; 参见〔美〕兰迪·查尔斯·埃平:《世界经济入门:改变你观察世界的81个经济学概念》,胡汉辉译,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18页。

^② 参见M. Berger, “The End of the Third World”, in *Third World Quarterly*, 15/2, 257—275。转引自Jeff Haynes, *Third World Politics*,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6, p. 4。

概念获得了持续存在和保持有效性的现实依据。因此,还有学者坚持将“第三世界”作为理解世界经济的一个关键概念。^①

不过,既然“第三世界”这一概念已经招致人们相当程度的猜疑和责难,为避免在概念上的毫无意义的争论,在使用上找寻一个替代概念就是一个明智的做法,况且已经有将世界划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成例,而“发展”的涵义应该既包括经济意义的,也包括政治意义的。另一个接近的类型划分,是依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地理分布上的巧合,即由于占多数的穷人大部分生活在北纬30度以南地区,因而将国家划分为富裕的“北方国家”和贫困的“南方国家”。虽然这种依据纬度作出的经济划分因一些例外情况(如显然不属于贫困国家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就处于南半球)而被认为不可取,但“这种以经济方式作出的全球的南北划分在许多方面比根据国界或意识形态集团作出的划分更有意义。”^②事实上,将世界划分为“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早已不再局限于经济意义了。

其实,“三个世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以及“北方国家与南方国家”,既是几组相对的概念又基本上概括了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尽管人们对于其中一些概念的有用性并不认同,而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的瓦解更使“三个世界”的提法备受质疑,但它们的确为认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确立了相对稳定和恰当的体系,也使人们对世界的分析获得了一个共同的话语空间;同时,由于这几组概念在内涵上的相互接近,如果没有事先的明确界定和赋予其中某一组概念特殊的内涵,它们在使用上似乎也不存在任何不能替换或混用的禁忌。

2. “体系内国家”与“体系外国家”

如果说“三个世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以及“北方国家与南方国家”这几种划分国家类型的方法,只是从不同国家在经济与政治等方面的属性上对国家所作的类型划分,是一种横向的划分;在将世界作为一个完整体系的意义上,尤其是在不同国家参与世界体系的意义上,世界又是一个高度分层和等级化的世界,不同国家因其与世界整体关系的差异而在纵向维度上又可以被划分为“体系内国家”和“体系外国家”。具体而言,“体系内国家”是指那些能积极主动参与世界发展进程,并对整个世界的发展方向和进程产生实际影响的国家;“体系外国家”是虽存在于世界体系中但却无力对体系施加有效影响,也无法排拒体系对其施加影响的那些国家。其中,后一类国家虽然存在于体系之

^① 参见〔美〕兰迪·查尔斯·埃平:《世界经济入门:改变你观察世界的81个经济学概念》,第117—118页。

^②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889页。

内却仍称之为“体系外国家”，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这类国家对于世界事务几乎没有发言权，更谈不上对世界进程产生积极和深刻的影响。这些国家是一些国力衰微的国家，它们因力量弱小而成为沉默的和被忽略的大多数。

国力强大的国家对世界体系的影响广泛而深刻，其中最流行和最普遍的做法就是为世界确定规则。国际法是世界秩序据以维系的原则，是约束国家行为的重要依据，它渊源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这个和约在本质上却不过是一些欧洲国家间的停战契约。如果说北美洲的重要强国美国由于其自身的欧洲背景，抑或出于其可以操纵或绕过国际法的自信而并未对此抵制，但至少有一种南方观点认为，“当代国际法历史地说是欧洲国际法，它的产生先于南方国家作为主权国家的出现”^①。

在今天的世界经济以及贸易体系中，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性政治、经济组织的成立，在很长时间内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联系的结果和重要依据，今天则成为世界政治、经济有序运行的重要（至少是表面上的）规则。这些制度与规则只是由少数国家主导的，大多数国家作为这些组织的后来者只能要么选择不加入而永远处于体系之外，要么接受那些没有经过本国参与而确立的规则和“惯例”。

国家在这一维度上的类型划分还是一种以国家功能为基础和依据的划分。这种类型划分方法不仅使存在广泛差异的国家获得了可比性，还构成了对世界进行动态分析的基础。

对国家所作的这种类型划分虽然凸显了世界不平等和不民主的令人沮丧的现实，但却是人们客观认识世界的一种现实主义的观察。

现在对世界的研究更多地集中于对世界大国及其关系的研究，因为正是这些大国主导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今日世界的格局以及世界未来的发展趋势和走向。对有影响力的大国及其关系的把握，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掌握，但这毕竟不是世界的全部。人们早就已经知道世界上的国家有大小、强弱、贫富之分。对于弱国而言，只有充分认识和了解强国及其主导的国际规则，才能保持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或在世界舞台上为自己争取到一个有利的位置；对于强国而言，为保持自己的竞争优势也必须更多地关注潜在竞争对手（当然是一些大国）。因此，小国、弱国经常成为大国之间竞争的筹码，在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中也往往被忽略或一笔带过。

3. 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

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作为国家的重要属性，也是一些国家选择合作伙伴和

^① Glenn P. Hastedt, and Kay M. Knickreh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A Changing World*, Pearson Education, Inc., 2003, p. 197.

结盟对象的重要依据和标准。因此,它也成为国家类型划分的一个经常的并且往往是隐性的标准和对不同国家区别对待的依据。这可能是意识形态标准的一个变种或衍生物,其结果就是基于意识形态差异之上的制度歧视。

1945年以来的世界在很长一段时间(或者说现在仍然)是以东方和西方作为不同政治制度的分界线和参照体系的。长时期的东西方政治上的冷战和经济上的相对隔绝,是东西方关系的真实状况,也是当代世界在一段较长时期的主要状态。将世界划分为东方与西方,而把数量众多的第三世界国家中的非共产主义国家排除在外,事实上是一种不严格和不彻底的国家类型划分,但在冷战结束前的几十年间却是人们认识世界的重要依据,并在事实上将世界割裂、隔绝开来。东西方之间的冷战结束了,但分别主导东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却可能不会随即消失,而是以其他不同的形态和样式遗存下来。

一般认为,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相对应,计划经济则是与非民主的政治制度相伴生和联系的。在国家类型的划分方面,这种制度差异体现于政治、经济方面就是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市场经济国家与非市场经济国家,其中民主国家应实行市场经济制度,而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也不会是民主国家。这种将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具体说是将民主政治制度与市场经济制度联系甚至对等的做法,提出了一个在近期内似乎还不太可能得到答案的问题:在经济方面,有趋势表明市场经济制度将是人类社会的主导经济制度,那么在政治制度方面,不同国家在怎样的制度安排上才体现民主价值方面似乎分歧远多于共识。事实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关于民主的冷战思维就一直主宰着世界不同国家和不同政治制度下人们对于民主的认识。在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民主问题日益成为许多西方国家对外政策的重要议题,一些学者和政策活跃人士甚至认为民主应成为国家对外政策的唯一基础。

在现实的世界,今天的全球经济似乎排斥所有非市场经济的行为与做法,因而使市场经济可能成为主导世界和各国国家经济的制度。但是,对民主问题的讨论却一直是学者们历久弥新的话题,政治家则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弹性、务实有时甚至是不连贯和矛盾的态度。民主与非民主是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因而一个国家被划为哪一类国家的问题极为敏感并可能触及民族感情。判断一种制度民主与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属于主观领域的问题,而以此作为划分国家类型的依据和标准也因有情绪化和不客观之嫌而不被普遍认可和使用,尤其受到被贴上非民主标签的国家及其民众的强烈反对和抵制,即使在现实世界它是一个很通行的做法,并在世界政治体系中使不同国家处于优势或劣势。

依据民主与否对国家进行令人信服的类型划分,虽然有诸多难以克服的障碍,但作为其依据和标准的民主却已经成为世界和各个国家的政治发展目标;

同时,不同国家在这方面的实践也为不同国家之间相互参考提供了成功或失败的样板,并为实现世界政治与经济体系的民主化注入动力。

与此相联系的另一个对世界的划分是将世界划分为“和平与繁荣区”和“战争与衰败区”。其中,前者具有这样的特征,如民主的政治体系,相对充足的资本、技术、现代通讯系统和食品的经济,总体上支持人权并与环境友善的经济秩序;后者则是由与此相反的一些特征来界定的。^① 对世界进行这样的划分,虽然考虑到了世界出现的前所未有的巨大鸿沟,但却又先验地预设了后一类国家难以改变的命运和世界在这种意义上的永久分裂,因而它对现实世界的观察具有明显的悲观色彩。

如果把国际社会比作一部戏剧,大国、强国、富国就是戏剧的主角,小国、弱国、穷国只能扮演配角,甚至只能充当观众。在后者看来,这个世界不过是一个与自己没有什么关系的别人的世界。在被等级化的国际社会中,一些国家永远是不被关注的“不能产生新闻的地方”。政治学对世界的关注应该是不留盲区和死角的。

总之,构成世界的不同国家类型,其划分标准各有侧重。将当代世界划分为三个世界(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体系内国家”与“体系外国家”以及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等不同的国家类型划分,分别侧重于经济发展水平、参与并影响世界体系的程度以及民主与否等不同方面,在客观性与主观价值判断方面优劣互见,但它们并不冲突或可以相互替代,而是互为补益。对国家所作的不同的类型划分以及相关的不同概念,体现了关注世界的思想者在不同时期对世界所作的不同角度的思考和关注,为我们观察世界提供了丰富的维度与视角,也有助于我们不断更新和修正对这个充满变化和不确定性的世界的认识。

二、当代世界与中国

当代中国是世界主要国际组织的创始国和缔约国,但由于1949年中国政权的更替,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变得复杂和微妙起来。在1949年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国际社会仍然只承认国民党政府所代表的中华民国(如联合国的席位),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社会的活动空间相当局促;同时,东西方冷战也使中国的国际环境十分险恶。非但如此,同属共产主义阵营的中国与苏联的交恶,使中国在共产主义世界的活动空间受到限制,但又又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中国与属于西方世界的美国的接近。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后

^① 参见 Glenn P. Hastedt, and Kay M. Knickreh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A Changing World*, p. 99.

相当长时期的外交策略,一方面是对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的准确回应,另一方面也是中国自我发展和壮大的权宜之计,但其成本是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失去了发言权。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之年,正是国际关系出现向集团政治转折的关键时刻。中国虽然贫困、落后,但在人口、幅员、地缘位置等方面的特殊意义以及国家自我生存的需要,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之始就注定会给世界带来强大的冲击力,也似乎不得不在世界的国家集团之间作出选择,从而使自己失去了中立的可能性。

有人说过,要了解当今世界,1919年春天的巴黎仍然是最好的起点。或许1919年的巴黎和会为当代世界秩序埋下了重要的伏笔,但把时间从1945年回溯近三十年又可能带来将问题复杂化的意外后果。因此,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作为影响当代世界格局的重要事件,是了解当代世界的一个恰当的起点。

1945年2月,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雅尔塔聚会举行了战时的最后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盟国领袖们围绕即将结束的战争对战后的诸多问题,尤其是东欧新解放的国家进行了专门和实际的考虑。随后于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召开的波茨坦会议,又对处理德国问题的原则,波兰西部疆界,控制黑海海峡,对意大利政策,对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芬兰的政策,战争罪犯,奥地利领土托管和参加联合国组织等问题作出了决定。可以说,这两次会议对于确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政治地图具有重要的决定性影响。

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宣称“世界各国的自由人民都在期待我们的支持,以维护他们的自由。”此后,他又解释道:“不论在什么地方,不论直接或间接侵略威胁了和平,都与美国的安全有关。”为此,美国的政治与军事势力开始介入对在其看来存在建立共产主义政权“威胁”的希腊。杜鲁门要求国会拨款4亿美元援助希腊和土耳其。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介入是美国承担起阻止共产主义在地中海东部扩大影响的开始,也是英国在这一地区持续了一个世纪的主导地位的结束。杜鲁门主义标志着美苏冷战全面展开。杜鲁门主义的提出及其实施,是西方国家在政治上实现联合的一个新的开始。

1947年6月5日,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指出以后几年中欧洲的需要远远超出了它的支付能力,而“美国应尽最大努力帮助恢复世界正常的经济繁荣”以争取“政治上的稳定和有保障的和平”。1948年春天,美国制定了欧洲复兴计划即马歇尔计划。在实施这一计划的数年间,美国共支付了125亿美元。这一庞大的计划对于欧洲经济的迅速复原具有重要作用。马歇尔计划使西方国家在经济领域中实现了联合。

1949年4月4日,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丹麦、挪威、冰岛、葡萄牙和意大利等十二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签订了北大西洋公约,宣布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建立这一组织的宗旨是缔约国实行“集体防御”,任何缔约国同它国发生战争时,成员国必须给予帮助,包括使用武力。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使西方国家完成了军事上的集团化。

在东方国家一边,1947年9月,苏联、波兰、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几个社会主义国家联合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成立了欧洲九国情报局,以加强共产党阵营的团结合作;1949年1月,又在莫斯科设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莫洛托夫计划),从而实现了经济上的合作。1955年5月11日—14日,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苏联、罗马尼亚、民主德国、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八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在波兰首都华沙召开会议,正式签订了“友好、合作和互助条约”,简称“华沙条约”。同年6月5日,华沙条约正式生效。至此,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完成了军事上的联合。

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大背景就是“西方阵营”的最终形成和“东方阵营”的基本形成。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前,中共提出“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的三项立国外交基本方针。其中,“另起炉灶”是指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是指新中国成立后不急于同帝国主义国家建交,而是要等一等,先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残余势力清除一下,以免为其留下活动余地;“一边倒”是毛泽东在1949年6月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出的。“一边倒”就是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一边。毛泽东在解释“一边倒”时认为,“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①

于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奉行“一边倒”的外交方针,积极发展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成员国的关系。同时,中国还扩大和加强处在美苏之间广阔地域的国家的关系,其中既包括欧洲国家以及日本、加拿大等国家,也包括亚非拉地区国家。这一时期,中国的外交政策一般被归纳为“联苏抗美”。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参与的外交事件和国际事务主要有:(1)毛泽东两次访苏;(2)抗美援朝;(3)反对美国和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4)参加1954年日内瓦会议,为促成印度支那问题的解决作出重要贡献;(5)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基

^①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80—81页。

本原则;(6) 参加万隆会议;(7) 主动呼吁美国,和平谈判解决中美分歧;(8) 着手解决与周边邻国的历史遗留问题,实行睦邻友好政策;(9) 支持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及其他阿拉伯国家争取民族民主运动的斗争;(10) 重视中日关系发展。

20 世纪 60 年代,中苏两党意识形态的分歧导致两党断绝往来,两党关系恶化。中国在这一时期奉行的外交方针是“既反帝又反修”。60 年代,中国主要发展了同亚、非、拉国家的外交关系,而 1966 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严重干扰了中国的外交工作,因此这一时期的外交成就主要是在 60 年代前半叶取得的。(1) 60 年代前半叶,同中国建交的国家有 16 个,其中 14 个新独立的非洲国家,另外还有古巴和法国;(2) 中国坚持支持亚非拉地区正在进行的反帝反殖民运动;(3) 60 年代初中国国家领导人对亚非国家进行了重要访问;(4) 中国坚持支持印度支那各国反对扩展侵略的斗争;(5) 反对苏、美、英三国签署的部分核禁试条约,提出全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倡议;(6) 在反“两霸”的同时,重视发展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①

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后,美国开始失去战后独霸世界的地位,而苏联凭借其在核竞赛中的实力使两国的相对实力发生了变化,也为中国调整外交战略提供了可能性。这一时期,中国确立了从东边日本到西欧,再到美国的“一条线,一大片”方针,实行“联美抗苏”。这一时期的外交成就为今天中国的国际地位奠定了重要的基础。1971 年 10 月 25 日,第 26 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第 2758 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安全理事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1972 年 2 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开始向正常化发展;1972 年 9 月 29 日,中日正式建交。中日邦交正常化;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为加强同第三世界友好合作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从 1970 年到 1978 年,中国同 59 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其中五分之四是第三世界的亚非拉国家。

中国社会在历史上就是一个自组织能力很强的社会,这也决定了它倾向于形成一个比较封闭的社会与政治体系。事实上,中国社会在很长的历史时期,或基于强势之上的优越感或处于劣势时自我保护的考虑,都选择了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的政策。因此,来自外部世界武力之外的任何手段似乎都难以打破中国社会的封闭状况,也从另一个方面彰显了不同国家政策对于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重要意义。在这种意义上,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不同的政策选择,而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也成为当代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

① 参见李寿源主编:《国际关系与中国外交》,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0—48 页。

史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改革开放以来,以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为准则,开展全方位外交,同世界上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是中国外交工作的总体思路。外交政策思路的转变,一方面是对国际环境所作的积极回应,另一方面则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必然要求。这一时期,中国除了巩固与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关系之外,还注意改善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积极发展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同时,中国还实施了多边外交方针,开展有效的政党间交流,充分发挥民间外交工作的作用,开拓军事外交。

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经济联系也因改革开放政策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实行改革开放前的近三十年,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经济联系是非常有限的。其中既有西方世界以及与中国交恶的苏联对中国进行遏制和孤立的原因,也是中国选择独立自主发展战略的一个结果。这种状况虽然使中国与世界疏远了,但也有助于中国避免其他发展中国家在本国经济还很幼稚的情况下过深、过多地卷入国际经济体系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从而使中国获得了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经济基础。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虽然较低,与外部世界的经济联系也极为有限,但却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为日后的改革开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取得了显著提高,但庞大的人口规模,却使其在人均维度上的多个指标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总体上,这一时期,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明显加大,对世界经济的参与也日益活跃。^①

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重要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以冷战的结束作为分期的依据。事实上,中国在冷战中到底属于哪一个阵营,不仅已有的美国解密文件已经证明了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世界在这方面的错误判断,就连中国自己也经常莫名其妙地迷失在两大阵营之间,不仅不能自外于冷战冲突,而且还由于1949年政权更替和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而被视作冷战中心由欧洲转向亚洲并使冷战国际化的诱因。然而,就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现实而论,冷战的意義要小于中国主动的政策选择,过分强调冷战之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意义可能会反过来偏离观察问题的真正焦点,从而模糊对问题的认识。

尽管如此,冷战的开始、持续与结束却是理解当代世界不可替代的有价值

^① 1950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为12亿美元,其中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为9亿美元,占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二;1978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为206亿美元,占世界贸易的比重不足1%,排名世界第三十二位;1990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为1154.37亿美元,排名世界第十五位;2001年,中国进出口总额达到5098亿美元,居世界第六位。参见高德步:《世界经济通史》(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19—424页。